

飘摇的传统

明代城市生活长卷

K248/50

明代城市生活长卷

陈宝良

著

湖南出版社

飘摇的传统



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

[湘]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穆陵宁
装帧设计：胡薇薇

飘摇的传统
——明代城市生活长卷
陈宝良 著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70,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1315-7
K·257 定价：19.20 元

总 序

季羨林

有一个事实，本来是彰明昭著的，却几乎为所有的中外人士所忽略（黑格尔似乎谈到过），这就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最爱历史，历史典籍的时间最久，最完整，最有系统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从蒙昧的远古轩辕黄帝开始，一代接一代，历数千年，一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历史典籍从没间断过。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算是一部通史。从班固以后就有了断代史。而且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百废待举的丛杂混乱中，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前一个朝代修史。这就是所谓“正史”。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杂史”、“野史”等等名堂，以致在《四库全书》中竟形成了“史”这一“库”。

我们不能说，上面提到的史籍都是完全可靠的，都是实事求是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信史”。中国史籍何独不然？一个推翻别的朝代的新朝代，为被推翻者修史，哪里能全讲真话呢？陆游诗：“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有人称史籍为“相斫书”或“断烂朝报”，似乎又贬得有点过了头。总之，我觉得，同别一些古国，比如印度，比较起来，中国史籍还是比较可靠的，其中神话和谎话，还不算太多的。

史籍多而全，有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历史有什么用处呢？

用处是很多的，意义是很大的。我们常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又说“鉴古知今，鉴往知来”。类似的说法还多得很。宋

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写了一部通史，命名为《资治通鉴》，所谓“资治”就是“有助于统治或治理”，用意昭然。历史还有“求真”的作用。历史事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就说它是什么样子，不歪曲，不浮夸，不有意或无意地说谎。从事实中抽绎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从中可以看出人类前途的走向，从而指导我们的行动，坚定我们的信心，尽量避免走弯路，走错路；尽量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一直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最后走向人类大同之域。这样的意义还不够大吗？

但是，学习历史求得历史知识，却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我们且来“鉴古知今”一下。在过去，学习历史要分清层次的。专门研究历史的专家（我想把研究生也包括在里面），必须读二十四或二十五史，再加上一些“杂史”和“野史”等等。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那么，六经也是必须读的了。至于古代一些著名的通史，当然也在必读之列。低于这个层次是一般高中等知识分子。如果他们能读《资治通鉴》和《纲鉴易知录》一类的书，就不错了。再下一个层次是一般识字不多或根本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大概对历史知识没有多大的兴趣，可他们的历史知识是并不少的。这大概主要归功于小说和戏剧等。一部《三国志演义》就能给人们不少的历史知识。中国人有几个不知道关老爷等“桃园三结义”的人物的呢？诸葛亮更是“大名垂宇宙”。一部《说岳》，又能告诉他们关于岳飞和秦桧的故事。《说唐》则讲的是唐代的故事。在中国，这类的书多得很。从这类的书中又产生了各地各种的戏剧。于是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就显然非常丰富了。至于这些知识可靠与否，那是不言而喻的。里面扑风捉影，添油加醋的东西，大量存在。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历史知识，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类小说，不但影响了老百姓，连文人学士也逃脱不掉。清初诗坛祭酒大诗人王渔洋就曾写过过落凤坡吊庞凤雏的诗，为时人所讥。

建国以后，文化事业有了进步。为一般读者所写作的历史书籍，日益增多。据我个人的看法，通过小说和戏剧来学习历史知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学习历史的方法和渠道大大地增加了。联想到我在上面讲过的历史的重要性，这个现象是十分值得欢迎的。

现在湖南出版社独具慧眼，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新办法，达到供一般读者历史知识，特别是历代社会情况的目的。他们的办法是以每个朝代的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为中心，描述城市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等各方面的情况，由小见大，由近及远，藉以达到了了解当时社会前进、历史发展情况的目的。这部《长卷》把学术性和趣味性结合或者融合起来，不讲干巴巴的历史事实，而能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美的享受中，把握住历史的脉搏，获得历史知识。《长卷》的作者们不是写小说，而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进行叙述的。这比以前利用小说和戏剧来学习历史知识，要好得多多了。我为中国的读者们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一套丛书预计将在本年8月底以前出齐。我祝它成功。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的。一个不懂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会知道去爱国的。这是我一贯的信念。是为序。

1996年4月2日

楔子

明帝国，这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王朝。通过戏曲小说，流传下来许多至今仍为里巷熟谙的故事与人物，诸如《玉堂春》中那位为爱情受尽苦难而终又皆大欢喜的苏三，《牡丹亭》中那位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那位蔑视神权、大闹天宫的孙行者，《金瓶梅》中那位为权势、金钱、肉欲而丢了性命的破落户西门庆。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城市中的梨园，抑或乡村的小茶馆，人们对这些故事、人物，总还是那么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国门之外的世界没有忘记朱洪武创立的大明帝国。那些历尽艰险、凭借大帆船来到大明的西方传教士，带回去了中国文化，他们记录的帝国的事情和风俗，确实让西方优雅的绅士们吃惊非小。炎黄子孙没有忘却大明帝国。《海瑞罢官》让老百姓懂得了在黑脸包公之外，还有一个海青天；《李自成》让老百姓知道了在侠客名单簿上，不单单只是水泊梁山义士，还有像李自成、张献忠那样的草莽英雄。

一部《金瓶梅》让人艳羡不已，有了“洁本”，不妨再去求“全本”，贪婪的劲头，如食鸦片一般。文人雅士，世俗百姓，概不例外。这似乎就是现代人对明代城市生活的感性认识。其实该书中反映的不过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侧影。若想了解帝国的城市风景，乃至雅致的烟粉生活，不妨再去读一读《帝京景物略》和《板桥杂记》。两相比较，方成合璧。

大致从正德时期（1488—1520年）开始，由于文化机制内部的矛盾运动，明代城市生活从结构的深层发生了剧变。一至万历中期，由于西方耶稣会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新的思想迅速萌生，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这样就在原有城市生活变革的基础上更加深了一步。在晚明文化的变革期里，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活跃。个体的、特殊的、纯自己的东西的扩展势必不能为旧的社会观念所见容，必然会同旧的社会观念发生激烈的冲突，同时这种冲突不能不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像晚明这样的时代，势必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觉，像杜丽娘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可能出现，而在封建关系的封锁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种风气突变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以及追求个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现象。套用明朝人的流行说法，就是“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无所障碍，肆无忌惮，完全是人性的直露、赤裸。至于具体的表现，则为对人格独立的孜孜追求，争取思想的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于以圣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那种灭没个人真性情而安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反映在城市风尚上，就是厌常喜新，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这一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以及各种生活风俗画廊乃至心灵呼声，在晚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闲暇时间渐多、旅游风日盛的今天，这句话已是妇孺皆知。殊不知，在明代，苏州的得名，并不仅仅是人造的园林之胜；杭州的名扬天下，也不在于西湖那天然的湖光山色，而是这两座城市中的人。据说，当时的苏州人聪慧好古，善于模仿古法制物，造假古董，所临摹的书画，冶淬的鼎彝，能令人真贋难辨。又操持全国各地城市的流行风尚，举凡斋

头清玩、几案、床榻，苏州人都喜选用紫檀木、花梨木为质料，式样尚古朴，不尚雕镂，即使需要雕镂，也多采用商、周、秦、汉的古式，以致为海内所效尤。当时流行两个新名词，这就是“苏样”和“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为“苏样”；见到别的希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一记载：时有一人刚到杭州上任做官，笞打一个身穿窄袜浅鞋的犯人，枷号示众，一时想不出如何书封才好，灵机一动，写上“苏意犯人”四个大字，人以为笑柄。

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譬如某地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亲眼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加以嘲弄。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杭州人喜欢搀假，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北京、南京又是如何呢？明代城市中曾很流行一句歇后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说的是出身在苏州的这位沈秀，即沈万三，据说在明初修建南京城时着实风光了一阵，虽遭朱元璋之忌而掉了脑袋，却从此落下了富堪敌国的盛名。北京的枯树年头一定很久了，当然是虬曲的，或许还是一株折杆掉枝的歪脖子老槐树，但不知在哪条胡同内？史无明载，不敢妄测。

不过，南京、北京决不是一个沈万三、一棵枯树所能替代。他（它）们或许一度是南北京的象征，但绝非这两座城市生活的全部。南京的得名，除了六朝古都的名头、虎踞龙蟠的形势，很可能与秦淮河两岸的河房、河中的桨声灯影以及旧院中的名姝有关。北京城给外方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也莫过于棋盘街的车马人声，灯市、宫市的古玩、方物，新帘子胡同的小唱、耍童，以及皇城外

的“私窝子”。

扬州有“盐都”之称。盐为一日三餐所必需。徽州盐商云集于此，除了求利之外，恐怕也是看上了扬州这个烟花粉黛聚集之地。他们心中想的是二十四桥的风月，在那里曲房密户，妓女会逐队倚门卖笑，是销魂的好去处。要不然，就是看上了扬州懂得琴棋书画的“瘦马”，娶回去做小妾，以尽于飞之乐。

开封城的繁胜，早已是北宋年间的旧事，大相国寺也只不过给人留下了淡淡的一点回忆。明帝国内的百姓看上开封，多半是因为城内设有“淫店”，从那里可以买到专供淫乐的希奇古怪的淫具、春药。

“苏州样，广州匠。”广州工匠的产品在明代很闻名。不过，若说起知名度，还应推广州濠畔朱楼。据说在盛平年间，濠畔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倘若不信，请看孙典籍的《广州歌》：“广州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枕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崱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衣月满江闻歌弦。”粉腻生活，亦可想见。

中国人很有口福，从老祖宗起就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留下了现在名扬四海的“孔府菜”。清帝国很幸运，在辛亥年被革了命，皇帝也被赶下龙椅，清宫菜满汉全席、民间菜烤鸭却被保留了下来，好像已成为硕果仅存的几样国粹之一。相比之下，明帝国倒是颇有些遗憾。明宫内的名菜烹龙炮凤，大可与满汉全席媲美；从当时的风靡程度来看，杭州的烧鹅也决不比北京的烤鸭逊色。两者的失传，实在是一件憾事。否则，今天的老饕们在大饱口福之余，也可谈谈明宫掌故，杭州风情，以助雅兴。

大家都知道，城市是被一堵甚至几堵城墙围起来的空间地域。城墙里面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有峨冠博带的士绅，有走街穿巷、打着各种响器、一年四季吆喝（市声）不同的贩夫，有高捋袖口、

囊子秤锤时刻不离身的无赖光棍，有衣不蔽体、存身冷铺、悲田院的叫化子，有穿金戴银、一身妖气的名姬、歪妓。

不过，在明帝国的城市人中，最惹人显眼的莫过于商人、妓女。

在传统社会，商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他们自己对走江湖、逛娼楼的生活乐而不疲，显得信心十足。张来仪《静居集》卷二中有一首诗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诗云：“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酹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宅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如此看来，这不仅是商人生活的自白，简直可以看作一曲“贾客乐”。

明代的大商巨贾，绝不仅仅是鲜衣怒马，金钱如丘，绫锦如苇，往来平康之间，一掷千金，只知一味贪图享乐，而是很有头脑，在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的同时，通过种种手段，提高社会声誉，光耀门楣。汪道昆《太函集》卷六七记载了徽商汪某教育其子时所说的一段话：“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商人已不满足于掌握“贾道”，拥有大笔财富，还要通“儒术”，博取科第，以便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商人喜欢附庸风雅，结交一些文人墨客，正如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中所说：“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他们在醉饱之余，在精神享受上也不乏追求，喜看戏听曲，通俗小说时常放在案头，夹在行囊，还盖造园林，把玩古董，收藏书画，研习诗文，其中不乏行家里手，有些甚至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儒商”决非只是现在的时髦词。若想做“儒商”，想必还应补学明代商人这一课。

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商人地位更是发生了显著变化。据说，被公认为文坛盟主的王世贞曾对朋友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这位朋友却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王世贞无言可对，只好付之一笑。这则小故事说明，王世贞虽然自命清高，却看到了徽州商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了文化上的追求；而他的朋友眼界更高，一言道破过去以圣贤之徒自居而羞于言利的文人正在朝着拜金主义者演变。

还有更有趣的例子可以引用。曾经与士子演出了一幕幕“才子佳人”喜剧的妓女，在从良上也开始向拜金主义靠拢。文名颇盛的状元钱福，息归田里后，听人说江都某妓动人，就整装去江都，但此妓已嫁盐商。后因贾人重状元才名，才得以与此妓一见。钱福作一绝句嘲讽这位妓女：“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诗句固然在嘲弄中透露出惋惜之情，但更多的还是自我解嘲。

正德至万历年间，明代城市处于鼎盛时期。当时物价甚贱，不妨开列一张正德初年南京市面上的物价单子：

猪肉每斤，好钱七文或八文；牛肉每斤四文或五文；水鸡一斤为一束，只须四、五文；莲肉用抬盒盛卖，每斤四、五文；干燥而大的河柴，银一两，可买30担；鱼、虾，每斤四、五文。

很清楚，当时的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无一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权贵富豪乃至大贾，当然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豪奢生活。即使那些小户人家，肩挑步担之流，每日赚得二三十文，也可过得一日了。到了晚上，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些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般玩耍，活脱一幅升平安乐图。

好景不长。到了天启年间，诸物腾涌，物价骤贵。再开一张当时南京城内的物价单子：

鹅一只，钱 500 余文；鸭一只，钱 200 余文；鸡一只，钱 200 余文；猪肉一斤，钱 40 余文；羊肉一斤，钱 40 余文；牛肉一斤，钱 20 余文；驴肉一斤，钱 20 余文；红布一尺，钱 15 文；绿布一尺，钱 15 文。

至崇祯年间，李自成已经起兵，马鸣嘶嘶，落叶萧萧，烽烟四起。可是，绍兴城中的民众还是醉生梦死，毫无知觉。张岱《张子诗牋》中有一首“寓山士女游春曲”，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只当还在“太平盛世”中，五谷丰登，贱如泥沙，穷欢极乐。天不亮，游人就乘船从郊外赶到寓山（山阴祁氏名园），青年男女尤其兴高采烈。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油头粉面，至有脂水涨腻之感，轻薄少年穿梭于姑娘中间，乘机向她们挑逗，弄得她们腮红颊涩，头也不敢抬。一直玩到太阳偏西，船上传来催人回家的阵阵鼓声，游人还站在码头上留连忘返。

当李自成的军队攻打北京城的炮声一响，惊醒了北京人，破碎了他们的升平梦，顿感颠沛流离的日子离他们不远了。北京陷落以后，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游兴皆无。随之而来的是清兵大举入关，满洲八旗兵的铁蹄践踏在南北城市的大街小巷。

甲申、乙酉之际的两朝鼎革，打破了士大夫富足、宁静的生活，使他们落到困顿、动荡的境地。南京秦淮河与杭州的盛衰，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感伤题材。想过去，金陵、杭州，选妓征歌，挟弹吹箫，一片繁华。看今日，时移势易，歌台舞榭，化为瓦砾。京城的繁华，转瞬成了过眼烟云；繁胜的秦淮，也是鞠为茅草；一直莺歌燕舞、游人不断的西湖，更是变成饮马之池，游人寥落，一片荒凉。往日的冶客先后埋骨青山，美人也栖身黄土；往日的河山已经远去，往事不堪回首，怎能不让人悲痛，不让人感伤！

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士大夫，大多怀有一种感伤情绪。感伤者都热衷于回忆。当昔日繁华的秦淮河畔已化为瓦砾场的时候，有

一人在破板桥边吹一曲洞箫，矮屋中一老妪开门出来道：“这是张魁官的箫声！”旧日之事，依稀犹在；人已作古，声却依然。满目荒丘，箫声悲凉。这是引发回忆的契机，而回忆导致了感伤情绪的产生。

清初时明朝遗民的感伤主义作品大量涌现。余怀的《板桥杂记》基调是留恋过去的生活，以感伤主义的情绪写出秦淮妓女的兴衰史。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借对自己小妾董小宛的思情，表达了一种对过去风流雅致生活的留恋，其情调同样是感伤主义。《如梦录》一书，记明代开封鼎盛之时的繁华景象，因李自成决河灌汴，使锦绣中原，一旦付诸东流，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无非也表现了对过去繁华生活的依恋。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以散文式的笔调写作历史的实事，诸如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的梨园、勾栏与节日生活。

那么，士大夫所百般留恋的明代城市胜景、繁华生活究竟是如何的呢？当然，它不同于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的“被发左衽”。随着大明帝国的建立，“胡风”旧习，一洗殆尽，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得以重新恢复确立。它也不同于满族入关以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的“剃发”、“顶戴花翎”以及旗袍。明代的城市生活有其独具的特点，这就是它既是汉唐以来民族传统的，却又新颖独特，对传统是一种叛逆，即明人所谓的“反道乱德”，从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我愿以拙笔尽力描摹，蜻蜓点水，雪泥鸿爪，多取角度，用文字作一幅明代城市生活的长卷，读者诸君不妨慢慢读下去——

目 录

楔子

首卷

- 一 街市行纪 (1)
- 二 走进胡同 (15)
- 三 城里人与乡巴佬 (21)

甲编

- 一 宫样与苏样 (28)
- 二 丰腴精食与粗茶淡饭 (59)
- 三 宫风士韵民用 (88)
- 四 船舫马房 (115)

乙编

- 一 社交礼仪 (125)
- 二 家礼：冠婚丧祭 (152)

丙编

- 一 节日与仪式 (165)
- 二 幽默人生 (177)

三	大众传播：民谣	(186)
四	粉墨登场	(196)
五	旅游生活	(209)
六	逗闷的乐子	(217)

丁编

一	皇冠心态	(233)
二	天潢印象	(248)
三	变性人的生活	(261)
四	士绅百态	(269)
五	市井众生相	(280)
六	人在江湖走	(293)
七	妇女面面观	(302)

末卷

一	城市风景线	(311)
二	文化变革的冲击波	(319)

首卷

一 街市行纪

关于城市的定义，由于不同学科研究城市时所采用的观点和方法有很大差别，导致对它的阐释各不相同。不妨试举几例：在地理学家眼里，城市是个像山岳一样的自地面升起的突出物；在历史学家看来，城市始终不过是一个政治单位；到了统计学家那里，则是通过居住区的范围，即人类生存的空间，以及居民的人数，来确定城市；经济学家一直很重视把城市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他们把城市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典型形式；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是当地那些共同的习俗、情感、传统的集合，这些东西是从当地的古代生活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并且具有某种典型文化的特征。（R. E. 帕克等著《城市社会学》第163—170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在中国，城市是一方的政治中心，有一整套管辖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官僚机构；是军事重镇，有坚固的城防设施以及一定数量的驻军；是权贵或其他有钱人的销金窟，有众多的供人消遣的青楼酒馆；是无赖游民的避难所，在城市的肮脏之地，犯罪活动最为猖獗；甚至是孳生市民阶层的温床，大量脱离了土地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市民阶层的后备军。

城市起源于最古老的、最具革命性的劳动分工，即耕田与所谓城市活动的分离。在中国，就城市起源而言，早在殷商时代已